

中日戰略互疑：過去、現在與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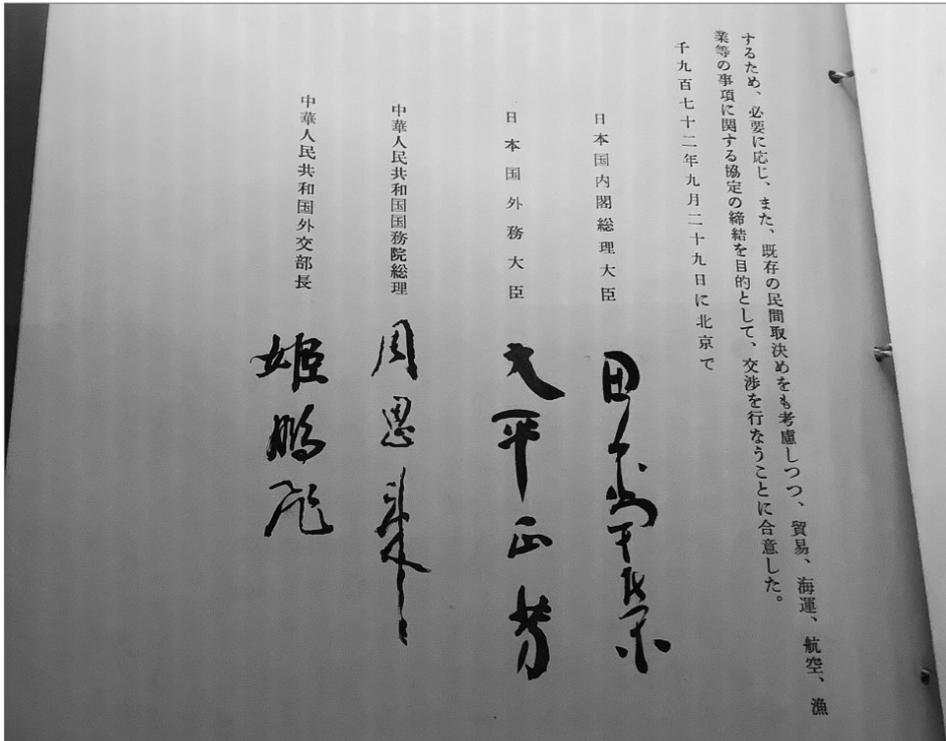
張慧

中日關係為甚麼總是出現周期性的不穩定？回顧每一次邦交正常化的十周年紀念，兩國之間的政治對立總呈現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規律。二十年前的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兩國關係由於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位於東京九段下、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而跌至冰點。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兩國關係則因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領土糾紛陷入低谷，幾近兵戎相見。相比之下，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兩國關係相對平穩，卻也暗濤洶湧，危機四伏。自2020年以來，世界形勢迎來大變局。中美大國競爭，領土糾紛迭起，台海對立再燃，中日兩國關係依然面臨諸多外部因素的挑戰。

回顧過去五十年，在兩國關係中不斷浮現的對立點實際上都是中日歷史遺留問題的重複爆發。本文嘗試回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關係的原點，意圖討論五十多年前尚未完成的中日和解如何導致雙邊關係總是起伏不定。中國和日本，作為東亞地區的兩個大國，究竟如何才能夠實現和平共處？筆者將從國際關係學（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角度來分析中日戰略互疑的根源、現狀和解決之道。

一 過去：未完成的和解

中日關係經常陷入周期性的不穩定，在筆者看來，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雙方在各個政策領域的認知差距而導致的猜疑所造成的。中日戰略互疑（或相互不信任）的原點，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初。在中日關係的研究領域中，有所謂「1972年體制」的說法，指的是1972年兩國首腦就歷史、台灣、戰爭賠償、領土等問題提出的一整套處理分歧的協議框架。正是這一框架的確立，構成了五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礎^①。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歷史原件史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圖片由張望提供)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1972年中日建交具有戰略意義。在蘇聯的威脅下，北京的對日建交有助於聯合東京應對來自北方的威脅，且有利於中國通過與日合作加強兩國經貿關係。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在當時中美接近的國際大環境下，中日建交可防止中美兩強在外交上「繞過日本」(Japan passing，即「越頂外交」)，且對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來說，在國內政治上能有效壓制自由民主黨(自民黨)內的親台勢力，更有助於日本商界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就是在這樣一個相互需要的國際和國內政治環境下，盡快實現邦交正常化成為當時中日兩國政府的合作共識。按照專攻中日關係史的日本學者、慶應義塾大學教授井上正也的說法：中日兩國沒有外交關係長達二十三年，卻在短短的四天內(1972年9月25至28日)完成了談判並實現邦交正常化，其本身就充滿特殊性。在井上看來，「1972年體制」存在的意義，不在於《中日聯合聲明》這個協議本身，而在於其構建了一個不激化兩國矛盾的爭端處理機制^②。

然而，在「同文同種，一衣帶水」的中日友好口號下，「1972年體制」卻也埋下了未來兩國關係對立的隱患。中日關係中的不少歷史遺留問題，如釣魚島領土糾紛和歷史認識問題，都被當時的兩國領導人以「求同存異」的方式有意識地擱置起來。然而，隨着老一代領導人(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周恩來、廖承志等)在兩國政壇的逐漸淡出，沒有戰爭記憶的新一代領導人進入權力核心，過去中日之間就敏感議題上建立的默契逐漸淡化，導致兩國之間的結構性對立再次浮出水面。正如美國華人學者何憶南指出，中日兩國在建交之初就歷史問題的話語建構可被視為一種「國家神話建構」

(national mythmaking) 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沒有縮短兩國之間的相互認知差距，也沒有謀求獲得普通民眾的充分理解，導致兩國在1972年建交後並沒有達成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和解^③。1980年代中日蜜月期結束後，兩國失去了一個坦率解決歷史認識差異的黃金機會，往後實現歷史和解的機會愈來愈渺茫。

二 現在：中日誤認知的擴散

在以上「未完成的和解」的歷史遺憾下，中日兩國邁入二十一世紀。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分析中，曾一度有觀點認為中日之間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和人員往來，將逐漸化解兩國之間在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進而促進兩國進一步合作。然而，進入2000年代，有學者發現，中日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依然無法化解兩國之間的政治對立，雙方的摩擦在小泉執政時期(2001-2006)反而變本加厲，令中日關係進入「政冷經熱」的狀態^④。

隨着2010年以後中國國力的日漸強大和日本國力的相對衰落，中日雙方的政治和社會菁英開始積聚對另一方的不滿情緒。從日本角度來看，外交防衛方面對中國的總體態度屬戰略防禦，其背後的心理是強烈的不安感和不確定性。日方有觀點認為，中國總是利用歷史問題向日本發難，謀求日方在其他問題上作出讓步，並對中國日漸進取的安全政策和外交姿態感到不安。日方對於中國崛起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究竟是戰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還是挑戰者？中國強化軍備的真實目的究竟是甚麼？從歷史上來看，中日關係過去一直處於日強中弱的態勢。2000年代後，中國航母艦隊頻頻東出第一島鏈演習，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在地理上感受到中國迅速崛起的第一線壓力。在政治制度上，日本一直自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一員，視中國為非普世性的異質國家。不少日本防衛問題專家認為，目前中國的一些行為不符合國際慣例，有挑戰現有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嫌^⑤。

另一邊廂，中方一直懷疑日方在歷史問題上反省和道歉的誠意，因此在解讀日本的安全政策時往往傾向將其擺在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脈絡中來審視，對日本在各個政策領域(例如台灣問題和釣魚島領土糾紛)上的外交動作抱着懷疑和警惕的態度。隨着中國近年急遽崛起，自2014年以來北京對日研究圈調整對日本的認知與定位，出現了所謂「中日關係拐點論」。該論點認為，目前中日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強中弱，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後慢慢轉向日弱中強，中日到底是合作夥伴還是競爭對手，是要實行戰略互惠還是戰略對抗，目前還是未知之數。北京對當時擔任日本首相(2012-2020)的安倍晉三的真正意圖一直有所懷疑，並存有強烈的不信任感。2014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會見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時曾明言：看不透安倍希望如何和中國打交道？推動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背後的動機是甚麼？「積極的和平主義」的真正意思是甚麼？當時，

安倍一方面表示願意打開大門和中方會談，另一方面其閣員在歷史問題上的發言和自衛隊在釣魚島海域的執法強化，令北京感到日方發出的信號前後矛盾，難以信任^⑥。

在此，筆者試圖借用國際關係學研究對外決策過程中的認知與誤認知的學術文獻和概念，來展示目前中日相互猜疑的模式。2021年去世的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傑維斯 (Robert Jervis) 在其經典著作《國際政治的認知和誤認知》(*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曾提到國家在對外決策時經常出現誤認知的形成模式。例如：認知相符現象 (cognitive consistency) 令決策者總傾向將新的信息歸入原有的認知框架，導致誤認知在決策中不斷被複製；歷史包袱現象 (historical burden) 傾向將性質不同的現實事件和歷史事件牽強地聯繫在一起，導致不恰當的歷史類比^⑦。此外，英國戰略學者布斯 (Ken Booth) 也曾提到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這一現象如何誤導決策者的對外認識。布斯認為，所有國家和社會都會有一種危險傾向，即常常以自己的文化視角去解讀或揣測其他國家和社會的行為和觀念，從而導致誤算和誤判。他主張，國家的戰略決策者應嘗試多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並多以其他國家的視角來理解世界並依此幫助制訂國家戰略，以「國家的戰略人」(national strategic man) 取代「理性的戰略人」(rational strategic man)，避免誤判發生^⑧。以下筆者將展示這些類型的誤認知現象如何發生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之中，以圖說明在「未完成的和解」的歷史背景下中日戰略互疑構造背後的複雜性。

(一) 認知相符現象

日本社會對中國認知的一大誤區，是把中國社會的對日不滿情緒放在「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這一固定認知框架下來解讀。過去幾十年來，日本社會看待中國社會的對日不滿，往往會從反日教育的角度來分析。例如，對於在2005和2012年中國的對日抗議遊行中出現的暴力事件，日本社會主流輿論便把原因歸結為反日教育，並把中國視為一個不可理喻的異質國家。日本社會似乎沒有明白到：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不滿，和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列強欺凌的屈辱歷史和悲情記憶直接有關。不少中國知識份子認為，沒有1930至40年代的日本侵華，中國的現代化或許早就完成了。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歷史不只是歷史學家的事，而且是今後兩國關係發展的教訓，必須依據恆定道德價值觀念來加以反省。日本社會的主流輿論也沒有認識到：1972年中日建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當年中國政府壓抑民間對日不滿的前提下締結的，這些不滿隨着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持續不斷的多元開放漸漸浮出水面。因此，把中國社會的道德訴求解讀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顯然是不準確和不全面的。

早稻田大學的華人歷史學者劉傑在其著作《中國的強國構想》中也從中日近代史的角度指出，日方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一直以來存有誤區。劉傑認為，

當前的中日關係和1930年代中日關係的構造相似，即中國社會充滿了呼喚恢復國家統一獨立的民族主義聲音，但日本卻從國際條約的合法性角度，把中國的對日輿論訴求歸結為當年國民政府的反日教育和反日政策^⑨。無獨有偶，有研究香港問題的日本學者也留意到，1990年代發生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對日抗議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香港對日抗議是以相對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並沒有出現衝擊在港日本人的暴力行為^⑩。這一研究也暗示：1997年回歸以前的香港對日抗議案例，顯然不能用「(反日)愛國主義教育」的認知框架來解釋，因為「(反日)愛國主義教育」這一因素在回歸前的香港是不存在的。

中國看待日本，基於懷疑日本反省歷史的誠意，也存在着固化的認知模式。2013年12月26日，時任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當年日本雅虎(Yahoo)網站調查顯示，八成日本網民支持安倍的參拜行為。當時，中央電視台名主播白岩松在新聞評論節目中慨歎，難道日本民意真的極速轉右，支持安倍為侵略戰爭暴行歷史漂白？其實，《讀賣新聞》在次年1月13日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47%的受訪日本民眾不支持安倍到靖國神社參拜。即使支持參拜的民眾，也未必認同安倍的歷史認識，而是出於追悼被無辜捲入戰爭的親人的樸素感情^⑪。然而，這一民間受害者意識，時而被當權的日本右派政治家挪用，把民眾對無奈被迫出征的家人的哀悼，轉換成對戰時日軍「英勇戰績」的光輝宣傳，令其他國家誤以為日本民眾也在全面支持安倍的右翼史觀。

從日本的內部視角來看，和平主義依然是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共識。這主要來源於二戰期間日本民眾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悲慘遭遇和針對「國家」這一他者的受害者意識。雖然這一認識與中國戰爭受害者要求的反省仍然存在一定距離，但這一反省本身是樸素的反戰和反核思想，與鼓吹為侵略歷史翻案的右翼史觀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民眾對二戰的普遍感覺是：1945年天皇突然宣布戰爭結束，他們感到震驚和被騙——軍國主義政府宣稱「聖戰不敗」，他們為此經歷空襲、忍耐飢餓、遭到核子轟炸，更失去親友。國家來人派發「紅色徵兵紙」(日稱「赤紙」)，連學徒和患重病的男性都要上戰場；心裏縱是萬般不願，但面對當時整個日本不正常的社會壓力只能強忍。打了敗仗，士兵、平民仍必須高呼「天皇萬歲」，引彈玉碎以示忠心愛國，軍政大臣卻可出爾反爾輕易轉向，為了維護國體和宿敵美國握手言歡。日本民眾的這一主流記憶，是把自己對立於戰前軍國主義主導的這個「國家」。通過每年8月在廣島和長崎舉行的「原爆」紀念儀式，以及對美軍東京大空襲的回憶，日本不少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和書籍中都隱隱地反映出這種對過去戰爭年代「國家」的不滿和無奈，對國家作為「集體」不把「個人」當成人的憤怒，是日本民族內部的戰爭反省。而這也形成了戰後遺族追悼被捲入戰爭的親人的感情基礎^⑫。

此外，日本社會內部有時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也和其意圖成為正常國家的國民心態有關，並不一定是為了否定侵略戰爭暴行。正如許多學者指出，日本在戰後一直處於半主權國家狀態，如澳洲國立大學日本問題專家麥考馬克(Gavan McCormack)把日本稱為「附庸國」^⑬。自

199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開始渴望擺脫戰後陰影，實現政治意志的獨立，令日本成為在國際上受尊重的正常國家。而這也影響到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對外態度，最能集中體現這一心態的其中一個案例，就是近十年前有關中日靖國神社問題的民調記錄。根據日本學者一谷和郎的研究，在是否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議題上，2001至2005年日本各大主要報章的民調數據顯示，反對參拜的日本民眾超過支持參拜的受訪者。但是，當把調查提問改為「是否支持外國政府在靖國問題上的抗議」時，各報民調卻顯示大部分日本民眾都對中國的施壓持抵制態度。當時日本普遍的輿論認為：日本要有自己獨立的判斷，不希望首相因為迫於外國壓力而停止參拜靖國神社¹⁹。這反映出日本人渴望受到別國尊重其獨立意志的心理，未必和否定侵略戰爭歷史的右翼史觀有關。

(二) 不恰當的歷史類比

由於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沒有徹底處理歷史問題，不恰當的歷史類比也經常發生在中方的認知構造中，對日本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感。例如，近年中國不少觀點傾向從歷史角度來分析日本的對台外交，強調日本對台灣一直懷有殖民情結，妄圖聯合美國遏制中國，並正加速對台軍事介入的準備。然而，筆者梳理了過去二十年日本對台政策在微觀層面的規律，發現「對台野心不死」這類情緒化的認知顯然是不準確的。日本的對台外交在微觀層面與國內政治、同盟政治和中美日三角關係有關，且這一政治計算並不一定指向支持台灣獨立或挑動兩岸矛盾的外交政策。

第一個微觀層面的案例發生在2006至2007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這位在自民黨內名副其實的鷹派首相向來主張對華強硬，上任初期曾引起北京的強烈警惕，恐其煽動日本國內的反中情緒。然而，正是這位被中方視為危險人物的右派政治家，在任期間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並實現了中斷已久的中日首腦會談。據日本政治記者清水真人在《首相的挫折——小泉繼任者 權力之黃昏》一書引述前內閣官房副長官下村博文回憶，安倍當時緩和了小泉時期緊張的中日關係，其實是2007年參議院選舉策略的一部分²⁰。在這一政治計算下，當年日本的對台政策隨着安倍調整對華戰略而轉向。筆者在研究日本對華靖國神社外交時，曾專程採訪在第一次安倍內閣執政期間擔任日本駐華大使的宮本雄二。宮本透露，早在2006年3月安倍當選首相前，外務省即開始構思和北京改善關係。這一交涉過程由時任外務省二把手、外務省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後來出任第二次安倍內閣的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主導。據宮本回憶，安倍陣營為了改善和北京的關係，刻意迴避與台灣的外交接觸，甚至謝絕台灣高官到日本訪問，以免觸怒中方²¹。由此可見，從微觀層面來看，當時日本的對台外交從屬於國內政治，並不是日本對華外交戰略、國家戰略、特定一派外交思想或殖民情結的產物。

第二個微觀層面的案例發生在2019年。當年3月，日本《產經新聞》刊登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的專訪。在訪談中，蔡英文希望與日本直接進行「台日安保對話」，包括共用解放軍動向等即時情報。消息一出，兩岸迅速引起熱議，但當年日本官方卻無意提升日台關係。事實上，日本的對台外交當時受到國際體系層面「中美日大三角」的支配。根據過往的規律：當日美同盟關係良好，在兩國目標一致地防範中國的情況下，日台關係會趨向緊密；反之，如果日美關係出現不穩或出現「繞過日本」的中美外交趨勢，日本會傾向通過對華接近來平衡美方的不確定性，日台關係就會出現疏離。2017至2020年間，面對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日美關係出現高度不確定性。安倍轉向實施現實主義思路的對沖戰略，向北京實施戰術靠近，在中美兩雄之間尋求平衡點。在這樣的戰略判斷下，日方宣示對台政策不可超越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處理台灣問題的底線。2019年「中美日大三角」制約「中日台小三角」的態勢，順理成章地限制了日本國內保守勢力對台接近的政治衝動。

第三個微觀層面的案例發生在2021年菅義偉(於2020年接替安倍出任首相)執政期間。當年是日美兩國五十二年以來首次重提台海安全問題，日本在7月公布的《防衛白皮書》也首次強調「穩定台海周邊局勢對日本的安全和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①，預示着日本開始調整對台政策。據《日本經濟新聞》「真相深層」欄目披露，美方在4月16日的日美首腦會談前，曾派遣熟悉東亞事務的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M. Campbell)訪問東京，要求日本和美國合作加強對中國的威懾，並向日本施壓，希望東京制訂類似美國《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法案。熟悉中方核心底線的日方顯然難以滿足美方的這一要求，為了防止時任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日美首腦會談時亦提出類似要求，同時避免華盛頓懷疑東京正在向北京過份靠近，「在首腦聯合聲明中加入關注台海安全」的措辭作為妥協方案登場^②。

同時亦有迹象表明，日方並不想深度捲入台海衝突：據日本「共同網」2021年12月27日報導，美國印太司令部指揮官、海軍上將阿奎利諾(John C. Aquilino)11月訪日時曾和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山崎幸二等高層舉行會談。據防衛省官員稱：會談後自衛隊高層臉色很差，似乎被美方施加了很大壓力。據稱，美軍的作戰計劃沒有考慮西南諸島居民捲入戰鬥的風險，日方對此有所不滿^③。12月26日日本放送協會(NHK)電視台播放的紀錄片《台灣海峽發生了甚麼事》亦指出，日方目前沒有足夠餘力在戰事爆發時組織撤僑，中央政府反而要求西南諸島地方政府先自行準備^④。

由此可見，當前中國主流的對日解讀，和日本內部的實情存在着很大差距，在微觀層面日方的決策更多是出於現實的安全考慮，沒有迹象顯示日本意圖藉此恢復對台灣的殖民野心。2021至2022年日本政府實際的對台方針是：最大程度上制訂應對台海危機的管理預案，在可行範圍內滿足美國的要

求，同時在外交上積極促進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其政策特徵更像是不得不捲入情況下的預防性措施，而非具有擴張性的主動軍事部署和挑釁。

(三) 民族中心主義

前述布斯提出的民族中心主義現象，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中又以甚麼形式表現出來呢^⑳？2014年末，日本官方積極利用《朝日新聞》就錯誤報導慰安婦問題的道歉事件，企圖向海外輿論澄清所謂對日本的「誤解」，強調戰時慰安婦不是國家強制行為（即所謂「狹義的強制性」）。2015年1月15日，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又就戰時日軍南京暴行的三十萬遇害人數，向中國提出異議。在中國人的普遍認知中，這樣的做法無疑是為侵略戰爭漂白，難以饒恕。但在日本社會，這一看待歷史的思維方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曾指出，中日的文化思維方式從根本上是不同的：中國人從普遍原理出發，然後深入到具體情況，把握全體以包圍局部。但日本人則執著於具體細節，重視特殊性，從局部開始以圖達到全體。日本學者選題往往從小處着眼，其學風經常出現「見樹不見林」的傾向，也是源於這種對事物理解的精緻細膩思維^㉑。熟悉中日兩國思維方式的《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村山宏也察覺到這一差別，曾撰文指出：中國領導人超越時空制訂長期戰略的能力，日本人學也學不會；中國有優秀的戰略，但中層到基層幹部能力都不高，無法貫徹戰略的事情時有發生。相反，日本的上層政府和企業一直都推出了很多戰略，但是真正具有正常機能的戰略卻很少；日本的中層和基層幹部並不參與描繪宏大敘事的戰略，卻對日常生活中自己的小小工作一片熱心，就算日本人的組織戰略非常曖昧，但因為中層和基層幹部都很靠譜，只要有差不多的目標就能良好運轉。如果說中國有「戰略病」，那日本就是有「無戰略病」，從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中日戰爭就常被用來證明日本沒有戰略^㉒。

在2000年代展開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2006-2009）的過程中，中方首席歷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步平亦留意到，中日雙方在解讀歷史過程中存在方法差異，即日方專家側重於對一個具體事實進行細緻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其客觀原因和決策過程，所以日方學者認為中日戰爭存在各種各樣的選擇和可能性。而中方專家則側重於近代中日關係的必然發展趨勢，強調近代日本對中國侵略的計劃性和一貫性，並依此模式來理解這一段歷史；中方專家認為，如果不研究各個行動間的前因後果的邏輯關係，無視事件的必然性與因果關係，而是強調各個決策結果的非連續性和偶發性，是一種很危險的「無構造的歷史觀」^㉓。

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歧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以上思維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誤解。例如，不少日本人認為把戰時日軍暴行和納粹德國的暴行相提並論並不妥當，因為在細節層面日軍沒有像德軍那樣進行種族大滅

絕。又如，以上討論的慰安婦問題，日本部分學者糾纏於在國內沒有找到「國家強徵婦女」的一手歷史證據。2014年《朝日新聞》就這一問題的公開道歉更加強了這一認識，令日本上下覺得有必要向外國澄清「國家強徵婦女」和「業者強徵婦女」的區別。再如，在南京暴行問題上，日本承認事件本身的存在，但認為中國提出的遇害人數不符合具體史料，在微觀層面有必要加以糾正。

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日本在細節上注重考證的精神不可否定，但正如步平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受害國的感情問題和政治問題。日本官方在政治上糾纏於細節，不但無助於中日雙方實現和解，反而容易給中國的輿論火上澆油，更加刺激受害國人民的情緒。步平建議：中國學者需要花更多精力對中日雙方的史料有一個更為細緻的解讀，關注當時每個事件發生的一些具體細節，而日方學者也應該意識到，在對每個具體事實作詳細說明的同時，也應對整體事件發展的過程進行思考^⑤。日本前外交官東鄉和彥也在2015年1月撰文指出，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角度來看，日本強調的慰安婦是否由國家強徵的問題，無法改變各國對暴行本質的判斷，在外國人來看，仍有「自己的女兒被強行帶走成為慰安婦」之感；日本不斷強調國家沒有參與強徵婦女，給海外的印象就是「現在的日本」在為「過去的日本」辯護，令日本的海外形象愈來愈糟。東鄉強調，日本應該致力於和倖存的慰安婦達成和解。

三 未來：中日和解的條件和當務之急

進入2020年代的中日關係，和1972年已經大不相同。有曾經見證197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學者認為，當前堅持發展中日友好極為重要，因為建交初期兩國在如此艱難的政治環境下都能克服重重困難，今日沒有理由做不到^⑥。然而今非昔比，中日國力自2010年代以來逆轉，日本社會的對華好感日益下降，且對中國進取的外交姿態感到不安。在相互猜疑的氣氛下，中日兩國都把自己視為受害者，而把對方視為加害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僅需要懷有改善中日關係的良好主觀願望，還應多從不同學科吸取實現和解的社科知識，以圖改善長期以來相互不信任的兩國關係。

國際關係學者唐世平2011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曾刊文談到達成國家間和解的客觀必要條件^⑦。這些條件從構造(structure)、施動者(agent)和渠道(channel)三個維度出發，包括了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領導人特質、公共知識份子；媒體和教育。

唐文認為，在構造這個維度，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和解成敗的關鍵。國際政治層面，冷戰嚴重阻礙了戰敗的軸心國(加害國)與受害國之間的和解；對於加害國而言，若受害國處於冷戰中的敵對陣營，則和解就難以實現。國內政治層面，政治領導人的變化與代際更替也是影響和解的重

要因素。例如，在德日兩國，更為坦率的官方道歉有助於國家間的和解，德國社會民主黨 (SPD) 背景的總理勃蘭特 (Willy Brandt) 在 1970 年的「華沙之跪」和日本社會黨背景的首相村山富市在 1995 年的道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施動者這個維度，開明的領導人和具有反思精神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也有助於國家間和解過程的展開。一切族群與國家都擁有某種集體（或群體）的共同記憶，這種記憶往往具有顯著的韌性，並構成國家的集體認同，而這一認同又反過來塑造國民的歷史記憶。所有的集體記憶，都是制度化和社會化過程的產物，存在着強有力的路徑依賴，立足於政治權力和政治過程。因此，成功的和解需要具有強烈道德信念和政治技巧的國家領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公共知識份子群體亦可利用自身的地位、聲望和知名度來塑造社會話語體系，進而影響和解的正義進程。例如，德國公共知識份子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曾參與有關德國二戰歷史的辯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歷史修正主義者試圖漂白納粹邪惡歷史的企圖。

在渠道這個維度，對集體記憶的重塑也是和解的關鍵，而和解只有通過兩國社會的交流才能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媒體與教育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受害國和加害國都會通過媒體（例如電影、電視、報刊和文學作品）來重塑或加強集體的歷史記憶；其次，教育是再造與重構下一代的集體記憶的關鍵。因此，國家內部的左翼與右翼往往會圍繞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問題展開政治爭論，因為這將影響未來一代的歷史認識。

如果把這些有關和解的客觀條件放在中日關係的脈絡下來審視，我們會發現，中日和解的實現在可見的未來依然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系統工程。國際政治層面，2020 年代中美競爭的國際格局，令作為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友日本很難向中國實施戰略接近。國內政治層面，中日兩國領導人都要顧及雙方內部對於另一方的反感情緒，在具體政策上的讓步空間有限。媒體環境層面，自媒體的興起令兩國傳媒進入不確定的「後真相時代」，傳媒能否起到防止中日誤解、促進和解的作用，仍是疑問。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日兩國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在教育 and 媒體層面將扮演相對關鍵的角色。兩國學者可以利用自身的地位、聲望和知名度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並促進兩國輿論的客觀討論，引導媒體向理性冷靜的方向發展。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際，筆者認為，中日兩國的當務之急是要首先拆除釣魚島領土糾紛這個在極大程度上可能危害未來中日關係走向的定時炸彈。有迹象表明，2010 年的中日漁船撞擊事件和 2012 年的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令日本國內在安全方面的對華危機感明顯上升。2010 年撞船事件後，日本民主黨政府釋放了撞擊海上保安廳巡邏艇的中國漁船船長，加深了日本人受到中國威脅的恐懼心理，令日本社會強烈感到受中國壓迫。在這一不信任的氛圍下，當中方提出日本需重回擱置共識，承認釣魚島存在領土爭議時，日方卻會懷疑中國背後的動機，質疑北京會否提出進一步領土要求。

2013年中國國內出現「琉球再議」的文章，更加強化了日本國內的這一認識，成為日本右派說服民眾接受中國正成為「擴張霸權國家」的論據²⁸。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在其《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一書中專門探討中日海上領土糾紛。作者指出，釣魚島主權爭議複雜，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雙方的國內政治和民族主義情緒失控、對雙方意圖的情報誤判，以及文武關係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的失衡，都極易觸發兩國間不必要的衝突²⁹。中日在釣魚島問題僵持不下，表面看似純屬領土問題的對立，但究其深層成因，與上文提到的中日兩國長年的相互不信任存有莫大關係。

如今，在日本國內，中方海警船「入侵尖閣諸島」的相關新聞經過各大媒體反覆炒作報導，令很大一部分不熟悉中日領土糾紛複雜歷史背景的一般日本民眾把釣魚島問題視為中國海上力量對外擴張的徵兆。在兩岸三地華人意識中作為歷史屈辱象徵的釣魚島問題 (或保釣情懷)，在日本卻已經蛻變成確保本國主權和安全的現實政治議題。對此，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在2012年前後就對釣魚島問題的惡化憂心忡忡，並曾經提出化解中日對立的可行方案。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者王逸舟在其著作《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中指出，在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中國要成為一個「謙虛而謹慎的大國」，以創造性智慧化解涉及主權邊界的安全挑戰。在中日領土糾紛問題上，王逸舟引用了早稻田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天兒慧的構想，建議中日兩國建立海上危機預防的議事規則和協作準則，在中日之間敏感而重大的主權爭端區域建立「特區」，防止領土危機危及兩國根本利益和周邊穩定³⁰。

中日關係最為理想的狀態是：日本勿忘歷史，中國寬容大度。兩個曾經兵刃相接的國家要化解歷史恩怨，絕非易事。正如2020年過世的哈佛大學東亞問題專家傅高義 (Ezra F. Vogel) 生前所建議的：中日兩國政府應該向兩國國民提供更準確的歷史敘事，並對當下的兩國關係進行更持平的講解，避免讓歷史問題繼續惡化³¹。同時，跨文化和解是極為複雜的族群間溝過程。雙方往往慣性以本國的文化視角來解讀對方族群的意圖和行為，令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的誤解和猜疑不斷加深。由於二戰結束後冷戰結構在東亞地區的迅速形成，使得中國和日本在和解過程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後遺症。面對長年的相互認知差距，中日兩國首腦和民間有識之士在邦交五十周年之際，都應嘗試加強溝通交流，學習換位思考，強化危機預防機制，構建相互信賴關係，為中日釋疑與歷史和解的實現注入曙光和希望。

註釋

① 參見 Ming Wan, "The 1972 System",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3-108。有關1972年中日建交過程的代表性學術專著和史料集，參見石井明等編：《記錄と考證：日中國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條約締結交渉》(東

京：岩波書店，2003）；井上正也：《日中國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栗山尚一著，中島琢磨、服部龍二、江藤名保子編：《外交證言錄 沖繩返還・日中國交正常化・日米「密約」》（東京：岩波書店，2010）。有關對中日建交過程的外務省官僚口述歷史記錄，參見中江要介著，若月秀和等編：《アジア外交動と靜——元中國大使中江要介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東京：蒼天社，2010）。

② 井上正也：〈國交正常化〉，載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頁 41-70。

③ He Yinan, "National Mythmaking and the Problems of Histor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Facing a Rising Power*, ed. Lam Peng Er (London: Routledge, 2006), 69-91.

④ 有關中日關係經濟相互依存的局限，參見 Michael Yahuda, "The Limit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ed. Alastair I.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2-85。

⑤ 有關 2000 年代日本對華安全戰略和安全政策的轉變，參見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0, no. 4-5 (2006): 739-76;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in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n Adaptive State*, ed. Thomas U. Berger, Mike M. Mochizuki, and Jitsuo Tsuchiyam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7), 229-55;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entful Realism' and Balancing China's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 no. 2 (2016): 109-50; Kei Koga, "The Rise of China and Japan's Balancing Strategy: Critical Junctures and Policy Shifts in the 201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 101 (2016): 777-91。有關第二次安倍內閣時期的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特徵的總結，參見張望：〈安倍治下的日本對華政策：從戰略制衡到戰術避險〉，《國際安全研究》，2021 年第 2 期，頁 86-106。

⑥ 有關 2012 至 2014 年中日之間的外交互動及其後首腦會談的實現，參見張望：〈政治生存與安倍的對華靖國神社外交〉，《中國周邊外交學刊》，2018 年第 1 輯，頁 199-212。

⑦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1.

⑧ Ken Booth, *Strategy and Ethnocentr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9), 13-20.

⑨ 劉傑：《中國的強國構想：日清戰爭後から現代まで》（東京：築摩書房，2013），頁 27-28、64-65。

⑩ 倉田徹：〈「反日デモ」に見る「一國二制度」——香港のデモでは、なぜ暴力事件が起きないか〉，《外交フォーラム》，第 18 卷第 7 號（2005 年 7 月），頁 76-81。

⑪⑫ 張望：〈宮崎駿の歴史洞見——《風起了》與日本戰爭記憶〉，《明報》，2014 年 1 月 21 日，A28 版。

⑬ 麥考馬克 (Gavan McCormack) 著，于占杰、許春山譯：《附庸國——美國懷抱中的日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⑭ 一谷和郎：〈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載家近亮子、松田康博、段瑞聰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關係——過去との對話・未來への模索》（京都：晃洋書房，2007），頁 53-54。

⑮ 清水真人：《首相の蹉跌——ポスト小泉 権力の黄昏》（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9），頁 121-22。

- ⑯ 有關2006年第一次安倍內閣對華外交與國內政治聯動的實證研究，參見Mong Cheung, *Political Survival and Yasukuni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7), chap. 5。有關該研究部分成果的中文版本，參見張望：〈理解日本對華政策：以政治生存為視角的詮釋〉，載包震琴等：《轉型期日本的對華認知與對華政策》(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176-98。
- ⑰ 《令和3年版防衛白書》，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21/w2021_00.html。
- ⑱ 重田俊介：〈中國寄りの印象払拭〉，《日本經濟新聞・朝刊》，2021年4月23日，頁2。
- ⑲ 參見張望：〈同盟壓力：日本介入台海的背後〉，《明報》，2022年2月6日，A12版。
- ⑳ 參見日本NHK電視台在2021年12月26日播放的紀錄片《台灣海峽發生了甚麼事——美中「新冷戰」下的日本》(《台灣海峽で何が～美中「新冷戰」と日本～》)，www.nhk.jp/p/special/ts/2NY2QQLPM3/blog/bl/pneAjJR3gn/bp/poEe10vYQo。
- ㉑ 有關中國對日認識中出現的民族中心主義現象，參見張望：〈日本是否正在重走軍國主義老路〉，《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4期，頁23-27。
- ㉒ 參見張望：〈戰後70年的日本視角〉，《聯合早報》，2015年1月28日，第20版。
- ㉓ 村山宏：〈中國的「戰略病」與日本的「無戰略病」〉(2013年9月16日)，日經中文網，<https://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special1/6548-20130916.html>。
- ㉔㉕ 〈步平：中日學者就侵略戰爭性質達成重要共識〉(2015年6月11日)，光明網，https://share.gmw.cn/theory/2015-06/11/content_15948744.htm。
- ㉖ 李廷江：〈我看2022年的中日關係〉(2022年2月20日)，愛思想網，<https://m.aisixiang.com/data/131597.html>。
- ㉗ Tang Shiping,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63, no. 4 (2011): 711-49.
- ㉘ 參見Ming Wan, "Japan's Party Politics and China Policy: The Chinese Fishing Boat Collision Incident", 《社會科學研究》(東京)，第63卷第3、4期合併號(2011年12月)，頁95-110。萬明指出，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後，日本民主黨政府將釣魚島這個中日政治問題錯誤理解為日本國內司法問題。另外，事件發生時首相和外相都不在東京坐鎮決策，亦直接影響日本對撞船事件的處理方式。有關2010年民主黨政府缺乏外交經驗、處理撞船事件失當的日方資料，以及2012年日本國有化釣魚島的國內政治博弈過程，參見春原剛：《暗鬪：尖閣國有化》(東京：新潮社，2013)。
- ㉙ 參見Richard C.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chap. 12。該書的中譯本參見卜睿哲著，林添貴譯：《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 ㉚ 王逸舟：《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58。
- ㉛ 傅高義(Ezra F. Vogel)：〈中文版序〉，載傅高義著，毛升譯：《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頁iv-xiv。

張 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準教授，*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學刊編委。